

目的论映照下的严复翻译策略解析

胡东平, 刘愜文

(湖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方法或策略必须通过译文的预期目的或功能来决定。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三个法则: 目的法则、连贯法则、忠实法则。依据目的论的基本原则重释了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 并基于严复所处时代对翻译的特殊需要, 从目的论视角解析了严复在译著《天演论》中为启发民智、保种自强所采取的翻译策略, 即在内容上对原文有选择地进行取舍和改造, 叙述人称用第三人称进行译叙, 文体上采用古雅文体。

关键词: 目的论; 翻译策略; 严复; 《天演论》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09)03-0092-04

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Yan Fu in Light of Skopostheory

HU Dong-ping, LIU Qie-we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Skopostheory holds that translation methods or strategies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intended function of the target tex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ree seedtimes of 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heir principles. Then it reinterprets Yan Fu's translation criteria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graceful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kopostheory.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history background of Yan Fu's translation, the author tries to analyze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his *Evolution and Ethics* with Skopostheory which are rebuilding original text selectively, narrating in third person, and adopting classical and artistic style.

Key words: Skopostheory; translation strategies; Yan Fu; *Evolution and Ethics*

20世纪70年代, 德国出现了功能派翻译理论, 其主要内容是目的论, 即翻译过程中以文本目的为首要准则。与以往翻译标准不同, 目的论所追求的并非译文与原文的对等或看似“完美”的译文, 而是以原文为基础, 强调译文的预期功能, 针对翻译要达到的目的, 选择最佳的处理方法。简言之, 译者须根据特定的翻译目的选择特定的翻译方法或策略。

中国的翻译事业约有2000年历史, 严格说来, 翻译理论始于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言》。“信达雅”三原则就是在其中提出的, 这三个标准在翻译界引起了极大反响, 诸家对“信达雅”的内涵可谓见仁见智。作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严复的译著都有一定的目的和意义, 常常借译书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见解。

通过分析其选择翻译方法的目的性, 笔者认为目的论与“信达雅”存在诸多相似性, 运用目的论的基本原则来重释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 可在分歧中更准确地把握严复的作品, 理解其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为启发民智、保种自强所采取的翻译策略。

一、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一些德国翻译学家提出来的, 它的出现为跨文化背景下的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形成阶段, 其创导者是凯瑟林娜·赖斯(Katharina Reiss)。1972年她在著作《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in Translation Criticism*)中第一次提出了功能性概念。她在坚持原文与译文功能对等的同时, 也承认在有些时候等值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 译者应该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 然后才是译文与原文的等值。第二个阶段是发展阶段, 理论研究的核心成

收稿日期: 2009-02-15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教改项目(湘教通 2008263)

作者简介: 胡东平(1964-), 男, 湖南益阳人, 副教授,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员是汉斯·威密尔(Hans Vermeer)。威密尔打破了以原文为中心的等值框架,创立了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在他看来,翻译过程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更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行为活动。第三个阶段是理论成熟阶段,其主要的成果来自贾斯塔·赫兹·曼塔利(Justa Holz Manttari)。曼塔利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发展了功能派翻译理论,特别强调翻译过程的行为方面,着重分析了参与者(翻译的发起者、译者、文本的使用者、信息的接收者)各自的作用以及参与者行为发生的语境条件(时间、地点、媒介)^[1]。以行为主义理论为基础,认为翻译是一种为达到某个目的而进行的复杂活动。

威密尔提出的目的论(Skopostheory)是在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并创立起来的。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活动都要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Skopos rule):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2]。作为一种有目的的互动行为,翻译行动的发起者,在通常情况下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而译者可以通过与发起者沟通和协商,参与决定译文目的。除了目的法则外,目的论还有另外两个法则:连贯法则(coherence rule)和忠实法则(fidelity rule)。连贯法则指译文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从而达到语内连贯,让译文的接受者理解。忠实法则指译文与原文之间的连贯性,即语际连贯。忠实法则从属于连贯法则,而这两个法则又都从属于目的法则^[3]。威密尔认为,目的论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为译者增加了可供选择的翻译策略,也减少了对译者的束缚,使译者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摆脱了常常困扰他们的毫无意义的直译^[4],为处在对等理论盛行时期的译者们“增删”、“调整”、“误译”甚至“改写”原文的某些成分提供了理论依据。

可见,“目的论”把翻译从“等值”或“对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译入语的新视角来诠释翻译活动,将译文的预期功能作为出发点,在不同的语境因素下,选择不同的也同时是最佳的处理方法,由此解决了以往许多翻译理论未能解决的问题,因而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为翻译理论界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

二、目的论视角下严复翻译标准的重释

中国“信达雅”翻译理论是严复根据自己翻译的

实践,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集汉唐以来译论之大成,于1898年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提出的。严复的“信达雅”是一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翻译标准。尽管有人对“信、达、雅”提出了怀疑甚至批评,尤其是“信”和“雅”,因为他们认为严译本身就不“信”。但必须承认,严复的翻译是为时代而作,他的种种翻译策略都有其特殊的需要,他的策略是以他的“任务”为导向,并为之服务的。正因为翻译的这一特殊性,使得他的“信、达、雅”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和倾向性,才导致“信、达、雅”三字能否成为普遍的翻译标准产生争议。而目的论与“信达雅”之间存在着许多契合点恰好为解释严复翻译标准与其翻译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开辟了一个新的窗口。

虽然“目的论”与“信达雅”起源于两个不同的国家和文化环境,它们产生的时代也相差近百年,但是两者还是有颇多相似之处。“信达雅”三标准中的“信”,即意义忠实于原文,与“目的论”中的忠实法则类似。“达”则与连贯法则有共同之处,两者都要求译文能为读者所理解接受。“雅”的提出体现译者明了译作读者及翻译的目的,类似于目的法则,即译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些特定的译文收受者为对象进行翻译^[2]。严复说:“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5]。”意思是,翻译中能够做到“信”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但是纯粹为了关注“信”这一点而忽略了“达”,就算是译了出来也好像没有译。可见在严复眼中“信”(忠实法则)是从属于“达”(连贯法则)的。同时,严复在翻译中运用古雅的字法句法引起士大夫们的兴趣,介绍西学,灌输新思想,来达到唤醒世人爱国意识,以文化救国的目的,此谓“雅”。“雅”正是严复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某种特殊翻译手段。特殊的翻译目的必然将“雅”推向核心地位。所以,“雅”(目的法则)又优先于“信”(忠实法则)和“达”(连贯法则)。用目的论的三条原则之间的关系来解释就是,忠实性从属于可读性,可读性由翻译目的决定。

对严复翻译标准和译作的评价,应该历史地、辩证地去看,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字对等与否。因为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决定了译文不可能在各方面都和原文完全一致。由于翻译目的决定了译文的忠实程度,译文既可以是最大限度的忠实,也可以是最小限度的忠实,需要对原文保留多少或改动多少都要视参与

者的翻译目的而定,从而走出了传统译论当中“对等忠实观”的框架,帮助人们对译文作出更公正更全面的评价。

三、严复的译作与翻译策略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从封建社会转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的民族危机和政治危机不断加深。西方先进的文明和野蛮的侵略汇成的洪流猛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文化。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看到闭关自守的危机,倡导译介国外作品,目的在于输入和传播西方知识,通过向西方学习,将西方先进的文化制度和学术思想介绍给中国各阶层,充分体现出翻译活动对译语社会文化的积极影响及相互助动的作用^[6]。

作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的代表,严复首先将爱国热情体现在他的翻译目的上。在1899年给张元济的信中,严复说道:“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悉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羈縻,亦得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为了尽一个爱国者的天责;为了炎黄种族不致沦亡;为了中华古国的复苏,通过翻译,启迪民智,这是严复的翻译目的^[7]。

也就是在这种翻译目的下,严复开始精心选择可译之书。他所译介的作品多系西方资产阶级著名思想家的代表名著。其内容覆盖面广,涉足了进化论、哲学、社会政治学、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广泛领域。他主要的代表译著有:赫胥黎(T. H.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孟德斯鸠(C. L. S. Montesquieu)的《法意》(*L' esprit des Lois*)、亚当·斯密(A. 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宾塞(H. Spencer)的《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约翰·穆勒(J. S. Mill)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甄克思(E. Jenks)的《社会通论》(*A History of Politics*)等等。他翻译社会科学著作不是为翻译而翻译,而是从爱国主义出发,选择有益于启发中国人民智慧的著作来译。所以他精心选择的作品能使西方的先进思想在中国传播,能发挥思想启蒙的作用,从而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8]。

在严复的诸多译著中,影响最为巨大、意义最为

深远的就要数《天演论》了,它是严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本着特殊目的以特殊方法译出来的^[9]。这一译著集中体现了严复在译学研究上的辉煌成就和卓越的历史功绩。严复专门为该著作设定了特别的翻译方案,让西方的进化论观点直接按照他的理解和需求引入到中国。

首先,他对原作的精髓根据需要进行有选择的取舍和改造,即,选译达尔文基本原理、斯宾塞普遍进化观和赫胥黎以人持天、自强保种的新观点。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中,将他自己认为能够“为己所用”的开启国民智的部分予以采用,而一些对开启民智“无用”的部分则大胆删去,这在当时特殊的社会条件下能让外国学术名著更为有效地为救国强国服务。《天演论》中宣传的客观进化理论和社会演进规律成了当时先进中国人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根据。使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程迈入了一个比较新的、更深入的阶段,对当时和“五四”时期的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

其次,他将原作的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使调整后的译文读起来类似于中国古代的说部与史书,增加了译著的可读性。同时,为了方便读者对原文的某些观点的理解,严复在原文之外添加了大量精辟的按语,阐明自己的见解。在清末闭关锁国的日子里,当时的士大夫们对于外面世界的无知程度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这些按语的帮助,他们根本读不懂这些国外书籍的译著,也没有人愿意去读。通过按语的帮助,原著的历史背景、论述精髓、原作者的历史地位等信息得以传达,从而方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原著。为了把自己的思想宣传出去,严复在《天演论》译著中的按语中特别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等观点。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严复的这些经过改编的译本及其译书中众多的按语,真切地为迷茫中的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试想,如果它只是赫胥黎著作的忠实译本,当时的中国人,恐怕不会有几个人去关注它。

最后,他在译著中采取了适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阅读习惯和理解能力的古雅文体。当时人们对外来文化还有抵触情绪,白话文也远未成熟,上层知识分子及官僚,虽然饱读诗书,但思想守旧,对“古文”特别偏爱。严复熟知当时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在翻译时使用“雅言”,使他们能够乐于接受西方理论。严复

追求译笔优美,很切合他要引起士大夫阶层兴趣的翻译目的^[10]。其后的相关评论,如桐城派大家吴汝纶为其所作的序言中,称其“文辞之美和议论之精”,证明严复的译著在语言形式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倘若严复是用“利俗”的文字翻译《天演论》,吴汝纶是绝不会为他写序的,足以看出严复的良苦用心。

由此可见,严复以“开民智,强国基”为目的而采取的翻译策略,不仅传“达”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更“达”到了唤起一大批青年学子、文化精英救国救民的意识。这完全同功能目的论强调译文应从其预期功能出发,针对不同语境因素,选择最佳处理方法的论断暗合。严复在译作中充分完成了翻译要求,在介绍西学的同时宣传了新思想,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启发民智,成功地在目的语中达到了翻译目的。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说:“严复翻译这套书,看来是有选择的”,“鼓动了我们上一辈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等,发扬民族意识,探索强国之道,从而引起了中国的维新运动”^[11]。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这样一条结论:严复结合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采取的一系列翻译策略,与功能目的论中翻译行为的目的决定达到预期目标的策略这一首要法则不谋而合。严复正是在晚清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翻译事业中,成为中国近代系统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制度的第一人,对整个中国学术界、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理论本身引起了几代译学家长期不懈的思考和探索。他所提出的翻译标准至今仍然对中国翻译实践具有重大

的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 [1] 范祥涛,刘全福.论翻译选择的目的性[J].中国翻译,2002(6):25-28.
- [2] 仲伟合,钟钰.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1999(3):47-49.
- [3] 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4] Vermeer, Han J Trans, Andrew Chesterman.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 [C]/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0.
- [5] 赫胥黎.天演论[M].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6] 邹白茹.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语境在翻译中的作用[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79-80.
- [7]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8] 张志建.严复学术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
- [9]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 [10] 张锦兰.目的论与翻译方法[J].中国科技翻译,2004(1):35-37.
- [11] 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黄燕妮